

博物馆学刊

第一辑

四川博物院 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博物館學刊

第一輯

四川博物院 編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物馆学刊. 第1辑 / 四川博物院编. —成都: 四川
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0-08245-0

I. ①博… II. ①四… III. ①博物馆事业—四川
省—文集 IV. ①G269.27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6135号



BOWUGUAN XUEKAN

博物馆学刊 第一辑

四川博物院 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唐海涛

启源制版

戴雨虹

徐 英

李 进 王 俊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210mm × 285mm

15.25

315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

ISBN 978-7-220-08245-0

50.00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四川博物院院刊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盛建武

编委会副主任 卢越 魏学峰

主 编 魏学峰

副 主 编 陈志学 梅锦辉

编委会委员 林向 谭继和 霍巍 段渝
段玉明 彭邦本 谢志成 梅锦辉
谢丹 谢凌 张孜江 魏葳

编 辑 唐毅 郭军涛 辛艳

序

盛建武（四川博物院院长）

博物馆作为收藏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的殿堂，真实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足迹；博物馆在保护、研究、展示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适逢我国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之世，博物馆在公众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公众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迎来了极佳的发展期。

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博物馆的相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开展业务、学术交流的阵地也有待于进一步扩大。为了使我国博物馆发展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探索和实践博物馆事业专业化、现代化、社会化的理论与方法，四川博物院特创办《博物馆学刊》。我们渴望通过自己的一点绵薄的努力，为中国特色博物馆理论的建设与实践增加一块新的砖石，使《博物馆学刊》成为全国各博物馆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交流平台。

《博物馆学刊》内容将推出博物馆学研究、文物研究与鉴赏、文物保护研究、著名博物馆评介、精品陈列展览品鉴、历史文化研究、民族民俗研究、巴蜀文化研究等专栏。我们将立足四川、面向全国，本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成为传播普及先进文化和优秀民族文化，介绍引进世界博物馆先进理论的平台；使其成为全国各博物馆沟通合作，展示博物馆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的桥梁。

《博物馆学刊》第一辑的出版，只是我们前进的起点，要将其办好并非

易事。希望《博物馆学刊》在发展过程中，关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前沿，不断创新；立足于博物馆行业自身的特点，创出自己的特色；坚持开放原则，广延贤才，使《博物馆学刊》成为有鲜明特色、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可读性强的读物。

《博物馆学刊》一经问世，无论主编者是谁，而事实上它已属于博物馆学界、属于全社会，期望在博物馆学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扶持下，在公众的呵护下不断成长、壮大！



四川博物院院刊

目 录

序 盛建武（四川博物院院长）

一、历史文化综合研究

先父冯汉骥与四川博物院 冯士美（四川省南光机器厂高级工程师）	003
四川盆地的文明化进程新探 林向（四川大学教授）	008
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 段渝（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014
蚕丛、柏灌、鱼凫时期蜀地农业初探 彭邦本（四川大学教授）	023
唐五代时期南宗禅在巴蜀的传播 段玉明（四川大学教授）	031
从岷山带来的胎记 邓廷良（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039
帝国基石之蚀：清代绅衿阶层流氓化趋向论析 陈志学（四川博物院研究馆员） 徐学初（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049
清代以前西藏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任卓（四川博物院馆员）	059
彝族漆器艺术 魏崴（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075
藏传唐卡艺术的文化审美内涵及其功能 康·格桑益希（四川大学教授）	080
浅谈藏传绘画门萨画派源流 张岩（四川博物院）	098
八邦寺《噶举金鬘》唐卡组画艺术风格研究 赖菲（四川博物院）	104
《三天君列纪》考 胡蔚（四川博物院馆员）	124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蜀志》比较研究 辛艳（四川博物院）	132

二、考古与文物

汉画“水陆攻战图”探析 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153
格套与空间:论汉画像研究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 霍巍(四川大学教授)	162
中国早期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 范勇(天地出版社编审)	170
四川重要文物资源概说——从四川文物资源与省博物院展览关系的视角 孙华(北京大学教授)	185
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 刘弘(四川凉山州博物馆研究馆员)	199
从文化遗存中看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形象——唐人眼光中的异族形象 张玉丹(四川博物院)	215
关于宗日遗址火葬墓的几个问题 赵卿(四川博物院)	233
马家塬战国墓地略论 李媛(四川博物院)	245
河南地区汉代壁画墓装饰空间研究 张琴(四川博物院)	274
岷山道上的南朝佛教伎乐人图式来源考 师若予(四川博物院)	296

三、藏品研究与鉴赏

关于张大千粉本的初步研究 魏学峰(四川博物院研究馆员)	319
“三年面壁信堂堂,且安笔砚写敦煌”——张大千与敦煌艺术 谢凌(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322
张大千书画题款分析 杨诗云(四川博物院馆员)	329
张大千扬名秋英会考 林玉(四川博物院馆员) 刘振宇(四川省文物管理局)	343
万佛寺石刻造像的分类与特征 袁曙光(四川博物院研究馆员)	354
万佛寺造像碑经变图之浅见——桥,多元世界的连接 何先红(四川博物院馆员) 师若予(四川博物院)	364
四川博物院藏唐代铜镜研究与赏析 张丽华(四川博物院馆员)	370
蜀中藏幽——揭秘四川博物院藏龙泉瓷 姜璐(四川博物院)	377
砚台与文人风尚浅析 陈静(四川博物院馆员) 李媛(四川博物院)	382

略谈和田玉的使用及其重要影响 韩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390
道教庙画管窥 吴加进（四川原道文化博物馆）	399
眉山三苏祠馆藏清代《秦邮帖》拓本 万波（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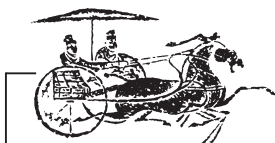
四、博物馆学研究探讨

不能遗忘的瑰宝——抢救与研究四川近现代地方名家书画作品势在必行	
盛建武（四川博物院院长） 胡蔚（四川博物院馆员）	417
因地制宜 提升展示水平——通江《巴山烽火》改陈综述	
谢丹（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422
馆藏石质文物在潮湿粉尘环境中的分析及保护 李钢（四川博物院馆员）	433
文物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探讨 彭代群（四川博物院馆员）	438
博物院图书服务工作的思考 雷玲（四川博物院馆员）	443

历史文化综合研究



四川博物院院刊



先父冯汉骥与四川博物院

冯士美 四川省南光机器厂高级工程师

【摘要】先父冯汉骥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人类学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四川大学任教，在华西大学社会系担任主任，在四川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下同）担任馆长。先父冯汉骥在四川博物馆担任馆长期间，曾主持过王建墓的发掘，并将四川博物馆由犀浦迁至皇城内的明远楼，后又迁至人民南路跳伞塔对面的“原子能展览馆”内，为今日之四川博物院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冯汉骥 四川博物院

先父冯汉骥（伯良），1899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乡冯家湾，1904年在家乡私塾发蒙，1909年入宜昌私立华美书院学习。1917年先父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华美书院毕业并保送到安庆私立圣保罗高级学堂。1919年先父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到教会所办的私立武昌文华大学，并获得免学杂费的全额奖学金。但入学后，校方要求先父信教并学神学，遭到先父的拒绝，校方遂要求先父在毕业后须全额偿还全部费用，故先父在毕业后省吃俭用，两年内还清了全部费用800余元。先父在私立武昌文华大学攻读文科兼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

1923年至1931年期间先父先后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湖北省立图书馆、浙江大学文理图书馆等担任馆长。

1931年夏，先父赴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为了解决学习和生活的费用，

先父在学习之余做过各种工作。后先父与裘开明、于震寰共同编撰了《汉和图书分类法》（A Classification Schema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Book）一书，该分类法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及美国大部分图书馆一直沿用至今。在此之后先父便在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现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做兼职华文编目以维持学习和生活之费用。1933年先父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研究院，1936年先父以《中国亲属制》（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的论文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杂志评论“该论文不仅在研究中国亲属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世界人类学研究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先父便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兼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即今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代理主任。

1936年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访问美国，专程到波士顿邀请先父回国筹建中央博物院人类学研究所。先父便辞去了哈佛大学的职务，并推辞了哈佛大学提前送来的终身教授聘书，于1937年初举家离开纽约经欧洲并在欧洲数国游历了数月后，于1937年8月7日在意大利热那亚登船返国。当船航行至红海时，得知上海已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于是在船到香港时全家只得由香港上岸经广州到武汉。时逢中央博物院已内迁至武汉，原有研究所已作了撤并，故无力再作筹建新的研究所的安排。李济特面向先父致歉，此时先父接到时任四川大学校长张颐（系先父在浙江大学的同事）的邀请赴四川大学任教。1937年11月初我们全家到达成都，先父在四川大学教授人类学、先史考古学和人生地理学。

1938年暑假，先父获得四川大学资助，只身前往四川西北高原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岷江上游川西北高原地区，考察羌族和藏族的现状及历史，历时百余天。先父风餐露宿，备经艰辛。此行除在民族学方面获得大量资料外，又在汶川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开创了川西北高原考古发掘之先河。后来，先父撰写了《The Cistgraves of Lifan》（《礼藩的石棺葬》）。1939年暑假，教育部组织了川康科学考察团，先父任社会组组长，并给了一个考察专员的虚衔以便进行考察工作。此次考察也历时百余天，对西康的民族进行了调查和分类，建树甚多，积累之资料厚达数尺。可惜的是，此项工作因故未能完成。此后先父仅撰写了《西康之古代民族》一文，介绍了若干观点。先父在完成教育部川康科学考察团的考察任务后返回峨眉，此时程天放派人向先父游说，以先父身为部聘教授，四川大学是党国的大学为由，要求先父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遭到先父严词拒绝，不再赴峨眉四川大学任教。

先父返回成都后，曾考虑应云南大学吴文藻教授的邀请，赴云南大学筹建云南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以便进行民族学方面的人类学研究，或考虑应在贵州的浙江大学邀请回浙江大学任教。恰逢此时先母陆秀正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因先母是北京师范大学公派留学，故按照惯例回国后要回母校服务两年）。此时，先父的好友蒙文通教授（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受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之托，希望先父能以遗弃在皇城内“四川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的两千余件文物为基础（包括在日本空袭后损坏部分），筹建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教育厅合办的“四川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是在任鸿隽任四川大学校长时建立的，由邓只淳任主任委员，有四川大学的一些教授任委员，如徐中舒教授、蒙文通教授等人。先父1937年到四川大学任教后也参加了该委员会。四川博物馆（因为是由“国立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教育厅”合办的，故一直用此名到

1949年底)理事会成员有郭宥守(理事长)、程天放(副理事长)和蒙文通、方叔轩、邓只淳、向楚等理事。该理事会于1940年初由理事会正式聘请先父为四川博物馆馆长,在城守东大街“四川省图书馆”内筹建“四川博物馆”。“四川博物馆”最初组成人员有陈仰之(任秘书,由四川大学调入)、曹增荣(任文书)、柏复武(任事务)、蒙学敬(任抄录),教育厅派一名会计沈××(教育厅主任会计沈省庵之子),另有一名事务员。

陈仰之是郫县犀浦镇人,当时在郫县犀浦镇北、成灌公路以南有一座荒废的庙宇,经他建议将其修缮后作为馆址。在修缮好后,将在皇城内的文物陆续搬到犀浦的馆址内,并布置了四个陈列室(历史文物陈列室3间,民族文物陈列室1间),于1941年春开始定期对外展出。当时“四川博物馆”有三个部门:(1)秘书组陈仰之任秘书,其下有曹增荣、柏复武等人。(2)历史组由先父自兼主任,其下有陈仰之、柏×(女,西北大学毕业生)、魏×(山东人)。(3)民族组由马长寿任主任,其下有柏汉先、蒙学敬等人。另外尚有刘泽、刘复章、王子荣等工作人员。由于馆员的工资甚低,月薪为3~5斗米,故有馆员陆续离开,先父为了生计也在“华西大学”社会系兼课。此时,先父仍想去云南大学或浙江大学任教,曾多次向郭宥守提出辞呈,但郭宥守却一再挽留先父。

恰逢此时先父在外西抚琴台“天成铁路成都办事处”的防空洞内躲避空袭,该办事处的负责人在挖防空洞时遇见了石壁,便就此事向先父请教。先父首先肯定这是一座墓葬,后经先父论证这是前蜀王建之墓。先父便对郭宥守说:“教育厅如能向内政部及教育部申请到发掘执照,我便可以暂时留下来。”郭宥守立即着手向内政部和教育部申请发掘执照,此时先父将博物馆的工作交给陈仰之和马长寿负责,并开始准备有关的资料,待教育部和内政部的发掘执照颁发下来后,于1941年9月15日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刘复章、刘泽、杨×、魏××及四川省政府派来的监察员1人。王建墓发掘成功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郭沫若先生曾评价如下:“抚琴台的发掘的确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在中国学术界必有极大的贡献,这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如是在欧美,想必已经轰动全世界了。听说冯先生是人类学家,在工作上极为严谨是值得庆幸的。”在王建墓中发现王建的玉册和座像,先父感到十分欣慰。在王建墓挖通的那天,笔者正在抚琴台上玩耍,在先父同意下也进入了墓内。笔者首先看到的是在台阶上有王建的玉册和汉白玉座像,在台阶下万年缸内还残存一些液体,在棺床上有一些彩色木质棺槨的朽木残片,而在这些朽木下还有散发着臭味的水银。王建墓发掘后,在社会上流传抚琴台挖到了金娃娃的谣言。这便引起了当地黑社会头目徐子昌的贪欲,派人闯入墓室,踩断了玉册(现存的玉册是经修复的玉册)。在没有抢到金娃娃和珍宝后,他们便将先父捆绑在乡公所三十六小时,第二天经四川省政府出面才放了先父。先父保护文物的决心并未动摇,又继续进行发掘工作。但此后王建墓的发掘又引起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覬覦,由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济与四川教育厅郭宥守签订一个合同,成立了以四川省主席张群为主任委员的“抚琴台整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吴金鼎主持,有王天木、王文林、莫宗江等人参加并进驻抚琴台现场,逐步将先父及四川博物馆参加的人员排斥在外。1942年9月王建墓的现场发掘工作结束,将出土的文物和现场收集资料搬到犀浦的四川博物馆内进行整理工作。吴金鼎、王文林也来到四川博物馆。半年后由吴金鼎、王文林撰写了一个发掘报告,但傅斯年和李济看了之后认为该发掘报告不能用,此事就不了了之。但他们离开四川博物

馆时却将全部资料和测绘的图纸一并带走。此后先父重新测绘了大量图纸和整理考证了大量资料。在1962年先父撰写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可视为先父近20年辛勤劳动之总结。该书除对墓室结构、雕刻和文物作了详细的描述外，还科学复原了墓室的细部结构，同时结合古代文献对主要的雕刻和文物作了考证和研究。所以该书的出版不仅是考古学重要的文献，也是我国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的重要文献。在该书撰写完成四十年后，文物出版社又多次再版了该书。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四川博物馆每周星期日将四个陈列室对外开放供人参观。但由于经费紧张，很少开展其他工作。由于薪水低，很多工作人员相继离开，如陈仰之离馆回家，马长寿到三台县东北大学任教……

1946年8月，外省籍的工作人员相继回家，馆内十分冷清。在犀浦开展工作十分不便，经先父多方奔走和努力下，才争取将博物馆搬至皇城内的明远楼。但由于此房太破、太乱，又有丐帮曾长期在内居住，为此修了围墙并将房屋的门窗加以修复，将明远楼的一排门房作为办公室及宿舍，明远楼的一楼辟为陈列室，二楼作为库房。但由于经费有限，以每月两车（汽车轮胎的板车）左右的速度进行搬迁，并在犀浦馆内留有工作人员看守。笔者记得在修复明远楼时曾问先父成都到处都是黑土地，为什么在皇城内却是黄土？先父告诉我由于皇城是明代藩王蜀王的宫殿，故皇宫内的黄土是从东山取来并夯实的，厚度达九尺九寸。20世纪40年代我国赠送外国的熊猫都是在博物馆的陈列室内等待转运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父任四川博物馆馆长，并任华西大学社会系主任和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1947年及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先后两次邀请先父去担任一个组的组长。后因先祖母及先祖父先后去世，故先父两次未能成行。1950年初，法国国家科学院曾聘先父为外籍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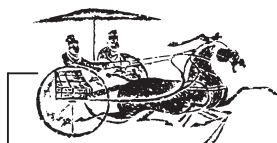
1950年西南区成立，为了保护西南地区的文物，成立了“西南博物院”，先父到重庆担任“西南博物院”的常务副院长，主持全院的工作。1956年西南区撤销，先父回到成都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创建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1957年中国科学院聘先父为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此时先父仍担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当时由于“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及“四川省政治协商委员会”需要皇城内的明远楼，需要将四川博物馆的一部分搬至在人民公园内楠木林后面，一部分在半边桥街。1959年博物馆又迁到人民南路跳伞塔对面的“原子能展览馆”（该展览馆是1958年苏联援建的，为展示苏联的原子能工业）内。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父住在四川博物馆，为外交部翻译了一部巴基斯坦史。后来中印关系恶化，先父又为外交部查找了中印、中英有关西藏地区的历史资料。当中苏关系恶化后，先父又为外交部查找了有关中俄边境的历史资料。同时先父为他的“中国文化起源多源论”研究课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也为一些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作一些学术上的指导。1975年11月先父的身体已经很弱了，但仍坚持为从湖北、湖南、江西、江苏、贵州及云南等地来四川参观的考古工作者作有关“夜郎研究”的报告。报告后提问十分热烈，提问和解答一直进行到深夜，共十余个小时。会后他便深感体力不支，立即进入医院治疗，此后，先父便时病时起。1976年10月先父在病床上得知粉碎了“四人帮”的消息，倍感兴奋，希望自己能早日恢复健康，再从事他所热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

作。但先父终因年事过高，身体虚弱，医治无效，于1977年3月7日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先父主持四川博物馆30余年，使之有今日之规模。先父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执教近40年，满园桃李，遍植滇池、黔岭、蜀道间。今西南地区考古、民族、文博工作者很多出自先父门下，风流余韵，绵绵不绝。

笔者文笔拙劣，在四川博物院成立70周年、先父逝世三十余年之际，特撰写此拙文，以资纪念。



四川盆地的文明化进程新探

林 向 四川大学教授

【摘要】本文通过对四川盆地东部的三峡古文化和西部的成都平原古文化的分析，结合考古学上的最新发现，揭示四川巴蜀文化区在文明化演变进程中的地域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论述巴蜀地区多民族文化格局对四川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巴蜀文化区 文明化进程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文明中心，它是吾中华古代文明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古代的东亚大陆上曾先后形成过许多文明中心，它们相互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亲缘关系，但又有其自身的区域特征。鉴于本区先秦文献的匮乏，用考古新发现来对本区的文明化进程特点进行分析，尤其是对四川盆地东部的三峡古文化和西部的成都平原古文化在文明化进程中表现出不同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对我国有关文明化演变进程问题的深入认识。本文拟从五个方面来观察和探讨。

第一，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古文明中心的西亚肥沃新月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北非尼罗河谷、南亚印度河谷等地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同处于北纬 30° ，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有利于抵抗天灾人祸。^[1]所不同的只是规模不大，而别有特点。本来北纬 30° 线上应

[1] (美) H. J. 德伯利著，王民等译：《人文地理：文化、社会 and 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